

弘扬瑞安先贤精神 走在改革发展前列

“瑞安先贤与近现代中国——浙江省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分论坛”专家学者精彩观点

周琳子 陈京子

瑞安建县 1770 多年来,人文荟萃。特别是近代,涌现出陈虬、宋恕等早期维新思想家,孙诒让、陈黻宸、项芳兰、洪炳文、周予同、缪天瑞等近代新知识的传播者,项湘藻、李毓蒙、许漱玉等一批发展工商实业的先进分子。瑞安过去的发展得益于文化,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更有赖于文化。源远流长的瑞安文化,已经成为推动瑞安创新发展的根与魂。

今年恰逢孙诒让、洪炳文诞辰 170 周年,项湘藻诞辰 160 周年,周予同诞辰 120 周年,缪天瑞诞辰 110 周年,沈靖诞辰 140 周年,10 月 22 日,“瑞安先贤与近现代中国——浙江省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分论坛”主题报告会在瑞安召开。活动主题定为“弘扬瑞安先贤精神 走在改革发展前列”。众多学者汇集一堂,缅怀瑞安先贤,挖掘提炼瑞安文化思想精髓,增强瑞安文化自信。

近年来,当地市委市政府注重先贤精神的挖掘整理,秉承“文化为魂”的理念,大力推进文化强市建设,先后获得全国文化先进市、中国曲艺之乡、中华诗词之乡、中国寓言大市、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基地等国家和省级文化“金名片”……系列举措为瑞安的“两个文明”建设注入强大活力。

本次“瑞安先贤与近现代中国——浙江省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分论坛”上,专家学者都展现了哪些精彩观点? 现摘录整理并呈现给广大读者。



孙诒让是“思想解放”的先驱

李天纲(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、上海市宗教学会副会长)

孙诒让是一位经学家、教育家,也是一位瑞安、温州地方新式事业的建设者,即所谓“乡绅”、“乡贤”式的人物。孙诒让一生的成就丰厚,目前却只是被推崇为“清末三大经学家”,即毕生与儒家经书为伴的学究人物,至于他的事功成就,在学术界很少有人讨论。这主要是受到了梁启超不当评价的影响。

梁启超把孙诒让、章太炎,加上上一辈的俞樾列为“正统派”,称之为清代汉学的三大“殿军”。但其中包含着贬义,认为三人的“古文经学”是保守的,康有为和他自己的“今文派”才是讲变法的。事实上,孙诒让等地方人士从事的新式事业,一点都不比康、梁的“维新”保守、落后。从办学成就来讲,江、浙地方士绅与外人合作的事业,比康、梁在“百日维新”中匆忙布置的事业更加成功,是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。



1903年孙诒让在温州艺文学堂演讲中,对明末清初的“利徐之学”作出正面评价,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明进步了如指掌。他肯定“西学”入华推动了中国的进步,批评中国许多地方风气不开,民情“守旧”,而瑞安和温州显然走在“开放”的道路上。在士绅“反洋教”惹出了“义和拳奇祸”的年代中,大多数的读书人对洋人同仇敌忾。孙诒让不怕见外国人,继续真诚地认可“西学”,与洋人并肩合作,确实就是他“思想解放”的标志。

孙衣言笔谈 显露其对国内外巨变的认识

张侃(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)



孙衣言被晚清士人誉为“特立之儒”,其道德学问已成时代典范。值得注意的是,孙衣言作为身处清代嘉道向同光时代转型之中的高级官员,他对中华帝国的危机、东亚国际关系的转型、西方殖民体制的威逼等,均有深刻的认识与深切感触。

孙衣言对来自周边藩属国的贡使和留学生极为关注,与他们热情交往,留下不少唱酬诗文和笔谈手泽。现孙氏家藏文献的《太仆公与安南行人笔谈问答长卷》,即是当时会面的珍贵材料,也是孙衣言这份情怀的历史见证,体现了“近者悦,远者来”的儒家理想,也展示了传统朝贡体系下国际平等交往关系。恰值法国加快对越南的殖民侵略之际,结合这一时代背景,该笔谈也隐含了孙衣言一以贯之的对西方强权侵略的批判与抗争。

温瑞是浙江现代化启动最早的地方

丁贤勇(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)



千年古县瑞安,历史上人才辈出,一脉相承。特别在近代,出现了“三杰三孙五黄”一大批开时代风气的杰出人物,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实业家。如重文重商的孙诒让、项湘藻,投身地方文化教育、公益事业,创办通济轮船公司,成为浙南创办时间最早、影响最大、经济社会效益最好的交通运输企业。还有李墨西兄弟,实业救国,创办新式罐头厂,获南洋劝业会金奖。还有一批出身草根的工商骄子,如李毓蒙、徐漱玉、吴百亨等。

这些本土企业的涌现,对温瑞意义远大。1876年开埠之初,福建商人主导温瑞经济;开埠 20 年后,宁波商人凭借在上海的经济实力,

成为主导温瑞的经济力量,并于清末民初达到鼎盛。与此同时,温瑞本土商人开始崛起,并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,开始主导温瑞近代经济。温瑞成为浙江现代化启动最早、成效最为明显的地方,温瑞也从“温不出”转而成“遍天下”,走出温州,走向全国,走向世界。

玉海楼是家风传承与乡风培育的重要载体

王兴文(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温州大学孙诒让研究所所长)



孙衣言创建玉海楼的初衷不只为藏书之地,更深一层的意义即为乡梓营造读书研学的风气,培育国家有用之人才。当时瑞安中学师生经常到玉海楼看书,不少温籍学者在年轻时也都受过玉海楼的泽溉,如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戴家祥、王季思等。同时,现存玉海楼《晒书目录》和《经微室书目》都专门列有“师友投赠”一类,多为自撰之作,且多有作者签名,弥足珍贵。孙氏父子具有远见卓识,利用玉海楼广泛藏书这一优势,使得瑞安地方文化得以代代相传,为促进乡风民风建设作出重大贡献。

综上所述,玉海楼是一座具有特殊意义的私家藏书楼,它是一座文化地标,将 19 世纪瑞安乃至

温州文化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现实社会中,如何以玉海楼为中心,重点打造玉海历史文化街区,使其成为以文化展示、文化发布、文化休闲、文化旅游等为特色的城市公共文化活动空间,是我们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。关于这一点,我认为瑞安民众和孙氏后人更有发言权。

此外,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薛玉琴认为,瑞安先贤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与贡献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。瑞安先贤不仅积极建馆办学振兴教育,还创办实业发展工商,使瑞安跻身全国新思潮前列,成为全省维新变法重地。对深化研究,她提出两点个人看法。一是要把瑞安地方史与中国近代整体历史结合起来加以研究;二是可以采取比较的方法,例如,可以将近代瑞安抑或温州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与南通作一比较,以突显区域特色。来自复旦大学的项宇研究员,就继续探索瑞安新学提出意见。他认为:复旦大学建立瑞安研究基地,可以帮助整理瑞安地方文献,建设近代瑞安研究数据库,加强上海与瑞安两地的学术交流。复旦教授可以来瑞安讲学,设立研究项目,可从新学在瑞安的传播、新式学校的创办等课题的研究入手。要重视新生研究力量的培育,通过多年的努力,必得更多学术成果。

瑞安知识群体既讲学术又重事功

徐立望(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、浙江省历史学会秘书长)



众所周知,瑞安历史上影响力涌向全国的学术文化群体,一次是陈傅良、叶适等人的永嘉学派群体,一次就是晚清孙氏、黄氏以及稍后涌现出的在陈虬、陈黻宸、项崧等的维新群体。后者在“西学东渐”的冲击下,通过对于乡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,重新塑造地方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。正是这样的一种认同和自信,使得一批瑞安人士摆脱了地方文化精英的标签,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人物,影响迄今。

瑞安知识群体既讲学术,又重事功。如孙诒让是中国传统经学的最后高峰,又是新式教育和企业的倡导者。陈虬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的重

要成员,又是中医实践者和维新报刊的创办者。又如陈黻宸,既是晚清史学大家,又是浙江谘议局的议长。瑞安知识群体在学术被时人敬仰的同时,又能走出书斋,这在晚清区域文化群体中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。

以社会科学的史学代替经学 是周予同经学史研究的逻辑终点

蒋伟胜(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)



瑞安先贤周予同先生是中国现代经学史研究的开创者。他梳理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、经学发展的脉络、经学各派别之间嬗变与历史影响等经学史上的重大问题。

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科学精神为指导,遵循经教分离、学中探术、以术言变的逻辑路线展开。首先,他把经学与儒教区分开来,在批判儒教的宗教性过程中,确立经学的学术性意义,指明经学可以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;其次,把经学演变史视作经学与政治统治术略的互动史,经学的产生与更替、经典名目的变化等重大问题都与政治术略有关系;再次,把经学看做一个演变的过程,是政治经济的变化过程在学术上的反映,要求以历史的方

法对其展开分期的研究,通过史学的研究让经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获得新的价值与意义。

对经学的“超经学的研究”、以社会科学的史学代替经学是周予同经学史研究的逻辑终点,反映了周予同在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努力保存传统文化、延续民族文脉的价值追求。

天涯多芳草 流水有知音

王文韬(温州大学音乐教育研究所所长,音乐学院副院长)



自 1997 年以来,我和缪先生(指缪天瑞先生,编者注)书信、电话往来 11 年。缪先生在他 101 岁又 4 个半月的人生路上,有效工作时间近 83 年,这是普通人两辈子都没有的!

先生称自己的长寿之道是舍得放弃——新中国成立前他放弃了在台湾的舒适生活,携妻子及幼女返回大陆,为新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竭尽全力;1983 年,他甘愿放弃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及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的待遇,默默地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一名普通的研究员,立誓编纂系列音乐辞书,填补空白,了却心愿。当先生得知自己曾工作过的温州大学于 1997 年创办了音乐学院时,惊喜与关怀时时挂在心田。“切磋现代乐艺,发扬民族精华”是缪先

生多次办学经验之总结,先生题的这十二个字为温州大学音乐学院指明了办学方向与目标。

“人生朝露,艺术才是千秋”,这是缪先生的人生感悟。而今,斯人已去近十年,惟其人生足迹中铭刻着的立德树人之精神,永远激励着我们!这,或许是瑞安纪念缪先生等先贤的目的之所在!

开风气之先的近代瑞安人

洪振宁(温州市决策与咨询委员会委员、温州政协智库专家)

近代中国变法图强的进程中,瑞安人勇当探路者,提倡新学,传播科学,兴办新式学校,发展工商实业,致力于民生改善。孙衣言、黄绍箕等人把变法图强的理念引进瑞安,陈虬、宋恕、孙诒让等人积极参与变法图强。由于知识精英的努力,现代性在瑞安、在温州不断成长,成为了推进早期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动力。他们的学生或同伴又从瑞安的诒善祠塾、利济学堂出发,走进温州、杭州,走向上海、北京,推动知识与制度的艰难转型,形成影响近代中国变革与发展的新的力量。可以说,诒善祠塾师生群体,是温州近代史上的第一个知识族群,这一群体的奋斗及其遗产,内化在温州文化血脉之中。

近代史上的温州,现代化的步履艰难而踟蹰,但温州人对变法图强的积极参与,对现代性的追求,对民生改善的探索,却异常的坚定。这种



追求,长期坚持下来,或在战乱中潜伏,成为这个地区的文化土壤,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,使得温州人的心理更容易适应变革。文脉在这块土地上传承,近代瑞安知识人那种敢为人先的精神和抱团合作的作风,后来被温州商人继承。那种勇于开拓的精神,在温州人身上代代相传。

改革开放 40 年来,温州人继续探索开拓,奋起创业创新,使得温州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,也不断给国人以新的启迪,温州也被人们视为中国发展民营经济的领跑者。

(本版图片由李文辉、庄颖昶提供)